

# IRT 理论视角下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的模式和类型

陈 虎

**摘 要** 基于一体化乡村旅游理论,提出一种与乡村振兴实践目标任务实现融合的本土化理论框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世界旅游联盟提供的 99 个中国典型案例进行量化解析,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大致可分为乡村产业与乡村居民共赢、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共治、文化和旅游共融 3 种基本模式。进一步,根据各地模式特征差异,又可分为主导发展、协同发展和均衡发展 3 种类型。其中,主导发展类包含共赢主导、共治主导和共融主导 3 种子类型;协同发展类包含“共赢+共治”协同、“共治+共融”协同和“共赢+共融”协同 3 种子类型;均衡发展类包含“共赢+共治+共融”全面发展和“共赢+共治+共融”重点发展 2 种子类型。推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根据各地实际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最终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关键词** 一体化乡村旅游;本土逻辑;乡村振兴

经济和时间的低成本正成为旅游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决策因素,近途乡村旅游成为消费新趋势。这也使得发展乡村旅游成为有效扩大乡村产业规模、弥补乡村传统产业功能短板的现实选择,并进而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学界对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总体而言,在理论上未能形成共识。其中的一条理论进路是,借助“一体化乡村旅游”(Integrated Rural Tourism,以下简称“IRT”)概念,理解乡村发展各个维度和多方利益相关者,以更好地描述和解释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IRT 理论框架过于庞杂,构成维度复杂,且子概念容易混淆,在应用过程中存在较多限制。鉴于此,本文试图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结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对 IRT 理论进行优化。在此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世界旅游联盟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发布的 2021 年和 2022 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中的 99 个国内典型案例进行量化分析,探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和主要类型。

## 一、IRT 理论及其本土化

### (一) IRT 理论

IRT 理论是欧洲多国针对乡村改革联合提出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欧洲农村落后地区的一体化旅

**作者简介:**陈虎,男,博士,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泰安,271018)。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科基金项目“疫情背景下旅游者出行决策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ZR202103030582)。

游”倡议后,由考利(Cawley)和玛萨特(Marsat)在詹金斯(Jenkins)和奥利弗(Oliver)的旅游一体化理论上形成的发展理论<sup>①</sup>。它既是基于旅游生产视角的理论框架,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思考方式<sup>②</sup>。该理论既强调生产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自然与人力等资源的利用,也强调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体验、保护、发展与协同等利益层面的分配。在评价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方面,该理论包含7个可以分解、分析和测度的维度<sup>③</sup>,分别是网络、嵌入性、规模、内生性、互补性、增权、可持续性,维度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sup>④</sup>。

在IRT理论中,网络(Networking)是指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稳定关系网络,包括当地社区(Local community)、旅游者(Tourists)、当地政府机构(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当地企业(Local enterprises)、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资源控制者(Resource controller)等<sup>⑤</sup>。网络并非事先设定好的,相对完整的网络是实现乡村旅游一体化的前提<sup>⑥</sup>。网络贡献最大的维度是嵌入性。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指旅游嵌入当地独特社会文化特征和身份,表现为被用于旅游发展的资源与本地文化、传统、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程度<sup>⑦</sup>。嵌入性越深,说明该关联程度越强,意味着旅游资源越有助于建立社会规范、制裁和信任,但嵌入性并非越强越好。因为当地产品和服务需要一些非嵌入性要素来维持一定的市场规模。在规模(Scale)方面,该理论强调旅游业是“随时间推移在一个区域内地理空间扩散的程度”<sup>⑧</sup>,且认为“规模并不取决于它在时间和地理上的分布,而是需要考虑地区承载力等因素的一种阈值”<sup>⑨</sup>。这种理解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对规模进行合理管控有利于将乡村旅游资源质量和游客体验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sup>⑩</sup>。这意味着规模需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增权(Empowerment)或赋权是指乡村居民或社区通过所有权、法律或规划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雷帕(Leiper)认为旅游吸引物往往包含在实物产权中,从属于整个吸引物系统<sup>⑪</sup>。这就意味着

①Cawley Mary, J. B. Marsat, Desmond A. Gillmor, “Promot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Networking in France and Ireland,” *Tourism Geographies*, vol. 9, no. 4(2007), pp. 405 - 420.

②Saxena G., Clark G., “Conceptualiz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Tourism Geographies*, vol. 9, no. 4(2007), pp. 347 - 370.

③Mercedes Marzo - Navarro, Marta Pedraja - Iglesias, Lucia Vinzó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of the Determinant Elements of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vol. 40, no. 4(2013), pp. 476 - 496.

④高清明、陈红霞:《基于IRT理论的社区旅游整合乡村资源功能研究——以四川阿坝羊茸·哈德的社区旅游实践为例》,《农村经济》2022年第3期。

⑤时少华、李享:《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信任与利益网络效应研究——以北京市爨底下村为例》,《旅游学刊》2019年第9期。

⑥Cawley M., Gillmor D. A.,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Concepts and Practi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5, no. 2(2008), pp. 316 - 337.

⑦Saxena G., Clark G., “Conceptualiz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Tourism Geographies*, vol. 9, no. 3(2007), pp. 347 - 370.

⑧Cawley M., Gillmor D. A.,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Concepts and Practi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5, no. 2(2008), pp. 316 - 337.

⑨Clark G., Chabrel M., “Measur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Tourism Geographies*, vol. 9, no. 2(2007), pp. 371 - 386.

⑩薛芮、余吉安:《基于地方品牌建构的乡村文化旅游活化路径》,《经济地理》2022年第6期。

⑪Leiper N., “Tourist attraction system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17, no. 3(1990), pp. 367 - 384.

旅游发展在需要乡村居民支持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乡村居民的需求、能力和价值<sup>①</sup>,这就是内生性(Endogeneity)。与此同时,乡村居民也可以凭借拥有的旅游资源权利对旅游发展产生影响,并从中获取岗位、设施、服务等多重利好,形成互补性(Complementary)。这加强了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交互,构建了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支持网络,另一方面也说明增权是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强调的是乡村旅游发展以不破坏区域资源为前提,在发展中实现多方成本与利益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层面的平衡。除去强调生态环境和社会承载力<sup>②</sup>,不少学者还认为可持续性不仅是单一的生态环境可持续,而且要反映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协调上。

## (二) IRT 理论的本土化

IRT 理论作为一个涵盖 7 个维度的综合发展理论,要义是强调整合(Integration)思维,以利益相关者网络为基础保障,最终达成规模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目的的多元协同战略。但该理论构成复杂,需要结合本土实践进行优化,才能成为分析我国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工具。可能的一条理论进路是,借鉴 IRT 理论的一体化发展理论和 7 个维度组成的评价体系成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按照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和基础探索出的不同路径,将现阶段我国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大致归纳为“产业与村民共赢”“生态与社会共治”和“文化和旅游共融”3 种基本模式,然后在这 3 种助力模式下展开更细致的分析。这 3 种基本助力模式是:

1. 乡村产业与乡村居民“共赢”助力模式。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农村三产融合的有效措施,通过三次产业融合可以有效扩大乡村产业规模,进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并且,发展乡村旅游既注重扩大市场规模,又注重通过旅游增加乡村就业岗位,营销乡村生态产品,并提高村民综合收入<sup>③</sup>,其目的是实现农村“生活富裕”。所以,本土化的 IRT 理论需要更加强调旅游发展的“规模”和“内生性”,强调生活品质 and 就业的“互补性”,以达到“产业兴旺”并进而推动“生活富裕”。这是乡村产业与乡村居民“共赢”助力模式的现实逻辑。

2. 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共治”助力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路径,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sup>④</sup>。IRT 理论中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指标可以表征乡村振兴目标中的“生态宜居”。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促成更有时代性的乡村治理<sup>⑤</sup>。这一有效治理需要通过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来实现,并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IRT 理论中的“增权”强调乡村居民或社区通过法律或规划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其实也是一种将自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因此,其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要求。

3. 乡村文化与旅游资源“共融”助力模式。乡村旅游的基础是农耕文化和乡土文化,其发展和延续有利于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育文化自信与乡土自信,助推文化整合与保护传承<sup>⑥</sup>。当然,也有利于村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构建互惠互信的乡村社会,达到促进乡风文明的目的。IRT 理论

①李燕琴、崔佳奇、施佳伟:《IRT 框架视域下的中国旅游减贫特征与模式》,《资源科学》2023 年第 2 期。

②Mowforth M., Munt I.,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lobalisation and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59.

③谷中原:《乡域生态产品四方协同生产机制建构与运作》,《湖湘论坛》2022 年第 2 期。

④蔡克信、杨红、马作珍莫:《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农村经济》2018 年第 9 期。

⑤陆林、任以胜、朱道才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地理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⑥贾未寰、符刚:《乡村旅游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机理、模式及对策》,《农村经济》2020 年第 3 期。

强调乡村独特社会文化特征和身份在旅游业的“嵌入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和谐稳定的“网络”,这有利于乡村文化遗产和文明进步。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资源化以及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并进而在本土文化遗产与乡村社会进步中培育文明乡风,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文化与旅游资源“共融”助力模式是回应这一课题的实践探索。

上述本土化后的 IRT 理论框架包括 3 种基本助力模式,涵括 7 个评价维度,呼应乡村振兴战略 5 个方面的总要求。后文将以本土案例为研究对象,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 3 种基本助力理论模式进行实证讨论和进一步解析。

##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世界旅游联盟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发布的 2021 年和 2022 年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为样本,按照可持续、可复制、可量化、完整性、有创新和社会影响等标准,最终确定 99 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共涉及 26.1 万字文本。总的来看,入选案例很好地满足了研究要求。其一,这些案例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世界旅游联盟会员单位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二,入选案例由该领域专家学者遴选得到,涉及 22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分布广泛(见表 1),且它们在对接帮扶、区域协作、创新治理机制、文旅融合、人才吸引、绿色发展、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均有积极尝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是揭示我国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对策措施、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有效案例。

###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标和样本情况,本文以本土化 IRT 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开展研究。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对文本资料进行搜集与系统化分析且目前被证明比较有效的理论方法。基本过程是:通过上述理论和方法将案例划归分类范畴,界定分析单元,然后通过编码分配资料,实现对案例所涉及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措施内容的量化分析,由此探究助力模式、类型与路径。

表 1 研究案例区域分布

地区	省份	案例地	个数	地区	省份	案例地	个数	
东北	黑龙江	汤原县;铁力市	2	华中	河南	凉水泉村;罗岭乡;龙王沟等	4	
	吉林	小山村;二合村;新开村	3		湖北	新铺村;卸甲坪土家族乡;王英镇等	4	
	辽宁	黄家沟村;大洼区;同江峪村	3		湖南	新化县;武陵源区;凤凰县	3	
华北	北京	黄山店村;梁家庄村;东村	3	华南	广东	河肚村;元坝村;封开县	3	
	天津	小穿芳峪村	1		广西	乔老村;那温村;红岩村等	4	
	河北	德胜村;易县	2		海南	马岭社区;什寒村;白沙黎族自治县	3	
	山西	云丘山村;镇横坡村;皇城村	3		西北	新疆	乌鲁木齐县;阔恰村;哈纳斯乡	3
内蒙古	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等		3	青海	边麻沟村		1	
	华东	上海	张马村;待泾村	2	甘肃	夏河县;孙集村等		3
华东	江苏	阳山镇;谢家路村;旺山村等	4	宁夏	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牛家坊村		2	
	浙江	梁家山村;大均乡;下叶村等	6	陕西	南堡寨村;袁家村;白马滩镇		3	
	安徽	碧山村;大湾村;卖花渔村等	4	西南	重庆	车田乡;荆竹村;竹贤乡		3
	福建	上杭县;山重村;培田村等	4		四川	凤舞天宮景区;九寨沟县等		4
	江西	东坑村;中源乡;潭头村	3	贵州	洪江村;龙山社区;化屋村等		5	
	山东	代村;龙湾湖;丘山谷等	4	云南	沙溪镇;玉湖村;老达保村等		5	
					西藏	林芝华侨城;卡如村		2

一方面,遵循扎根理论“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研究步骤,通过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20.0 执行编码<sup>①</sup>。同时,为检验理论饱和度,邀请另一位学者随机对 10 个案例样本进行重新编码,发现与软件编码相一致,同时没有新的概念与范畴出现,基本说明本研究对编码的提取、维度的归纳是有效的、可信的。

另一方面,为解决案例在共赢、共治和共融 3 种基本助力模式上存在的重叠问题,对每个案例呈现在 3 种基本助力模式上的节点数量进行整理,并通过 SPSS 24.0 对其进行三维空间矩阵分析。由此,将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措施较为一致、主导性较强的案例命名为主导型,并细分为共赢主导型、共治主导型、共融主导型;将乡村振兴发展措施兼顾两种模式的案例命名为协同型,并细分为“共赢+共治”协同型、“共治+共融”协同型和“共赢+共融”协同型;将乡村振兴发展措施涉及 3 种模式的案例命名为均衡型,其中措施多样的命名为“共赢+共治+共融”均衡全面发展型,措施集中的命名为“共赢+共治+共融”均衡重点发展型。由此,获得 8 种发展类型。

### (三) 开放式编码和范畴确定

将 99 个案例文本导入 NVivo 20.0 软件,遵循逐行逐句分析的编码原则进行,最终形成 1437 个参考节点,归纳形成“推广低碳生活,发展低碳产业”“保护生物多样性”“扩大旅游用地规模”等 50 个初始范畴(见表 2)。经过人工手动整合和反复比对类属特性和维度,进一步凝炼初级范畴,得到“生态可持续性”“物质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所有权”“法治与规范”“规划”“参与和受益者数量”“生产规模和产品多样性”等 18 个主范畴。

## 三、结果分析

### (一)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措施特征

依据一体化乡村旅游理论的 7 个维度,对 99 篇案例中提到的 1437 项发展措施进行编码。可持续性、增权、规模、内生性、互补性、嵌入性和网络 7 个维度以 234、239、198、112、250、111 和 293 个参考点,分别占 16.3%、16.6%、13.8%、7.8%、17.4%、7.7% 和 20.4%(见表 2)。其中,可持续性、增权、互补性和网络 4 个维度高于 14.3% 的平均水平,显示我国不仅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产业效益,还重视利益相关者网络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的保障效益,并且在乡村生态、物质基础和文化的可持续性,以及通过所有权、法规、规划等来优化地方政策方面也有较为显著的表现。基于本土案例可以发现,99 个典型案例地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大目标。

数据显示,初级范畴“文化设施建设”“规范旅游服务标准”“政府协助村民旅游创业”“旅游形式更加丰富”“利用本地资源”“提供工作岗位”“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旅游活动反映本地生活方式”“政府指导产业布局”和“政府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方式”10 个参考点数大于 50。这表明,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和部署者,也是实施战略的引领者和执行者。二是提升乡村的内生动力。通过政府协助村民旅游创业、旅游景区提供工作岗位等措施建立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三是重视外部要素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外部产业和资本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四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将避免同质化、建设文化设施、规范旅游服务标准和提升游客体验等作为重要措施。

### (二) IRT 理论视角下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

由表 2 可见,本文归纳得出 7 个核心范畴的 18 个主范畴,均有一定数量的参考点作为支撑,而

<sup>①</sup>Makri C., Neely A., “Grounded Theory: A Guide for Exploratory Studie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 20, no. 3(2021), pp. 1-14.

共赢、共治和共融 3 种发展模式在 99 个案例中表现较为相当。其中,共赢模式以 560 个参考点占总数量 39.0% ,共治模式以 473 个参考点占总数量 32.9% ,而共融模式则以 404 个参考节点占总数量的 28.1% 。

表 2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 IRT 维度表现

发展模式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级范畴	节点	占比	
共赢助力模式 560/39.0%	规模 198/13.8%	参与和受益者数量 25/1.7%	旅游人数增加	19	1.32%	
			吸引新细分市场	6	0.42%	
		生产规模和产品多样性 128/8.9%	旅游季节波动性减少	5	0.35%	
			开发新旅游产品	26	1.81%	
			旅游形式更加丰富	97	6.75%	
			规模促使平均成本降低	18	1.25%	
	内生性 112/7.8%	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 45/3.1%	构建线上线下营销体系	27	1.88%	
			利用本地资源	80	5.57%	
		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 102/7.1%	推广本地食品	22	1.53%	
			关注居民素养 10/0.7%	强化居民的资源利用和责任意识	10	0.70%
			旅游企业为居民提供便利 62/4.3%	提升公共交通系统	23	1.60%
				口碑扩大当地知名度	30	2.09%
	互补性 250/17.4%	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便利 188/13.1%	服务共享	8	0.56%	
			设施共用	1	0.07%	
		生态可持续性 96/6.7%	减少居民外出打工	8	0.56%	
			提供工作岗位	78	5.43%	
			遗迹重建	35	2.44%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67	4.66%	
共治助力模式 473/32.9%	可持续性 234/16.3%	物质可持续性 35/2.4%	推广低碳生活,发展低碳产业	37	2.57%	
			保护生物多样性	7	0.49%	
		文化可持续性 103/7.2%	控制游客数量	3	0.21%	
			利益相关者具有长远眼光	49	3.41%	
			扩大旅游用地规模	17	1.18%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18	1.25%	
	所有权 47/3.3%	文化设施建设	文化设施建设	67	4.66%	
			发展精神文化	25	1.74%	
		法治与规范 77/5.4%	社会文化提升	11	0.77%	
			促使政府投建公共设施	26	1.81%	
			促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21	1.46%	
			政府出台规章制度	1	0.07%	
	增权 239/16.6%	健全旅游市场监督	健全旅游市场监督	3	0.21%	
			规范旅游服务标准	73	5.08%	
		规划 115/8.0%	政府牵头实施协同治理	48	3.34%	
			政府协助村民旅游创业	60	4.18%	
			政府加大贷款支持力度	7	0.49%	
			旅游活动反映本地生活方式	60	4.18%	
共融助力模式 404/28.1%	本地居民身份认同 63/4.4%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3	0.21%		
		追求本地特有手工艺品的价格溢价	9	0.63%		
	本地文化和传统的嵌入 48/3.3%	旅游产品使用地方品牌	32	2.23%		
		产品标志统一化	5	0.35%		
		通过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传播当地文化	2	0.14%		

续表

发展模式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级范畴	节点	占比
		乡村空间主人 21/1.5%	居民为游客提供旅游指南	16	1.11%
			主客联系加强	5	0.35%
			地方企业客户联系稳定	3	0.21%
	网络	压力集团 90/6.3%	多利益相关者联合管理	49	3.41%
	293/20.4%		多方合作组织节庆活动	1	0.07%
			小企业互相扶持	37	2.57%
			企业与各级政府合作营销	10	0.70%
		资源控制者 182/12.7%	政府指导产业布局	51	3.55%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方式	121	8.42%

说明:1. 共计 1437 个节点;

2. 发展模式、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初级范畴后面的数字是参考节点个数和占比。

一是共赢助力模式,即“乡村产业和乡村居民共赢”助力模式,涵盖规模、内生性和互补性 3 个维度,分别以 198、112 和 250 个参考点,各占样本数量的 13.8%、7.8% 和 17.4%。该模式侧重经济价值生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直接体现,旨在通过旅游经济价值达成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两大目标。在规模方面,通过发展民宿、民俗、研学、冰雪、红色等多种旅游形式实现乡村旅游规模扩张。在内生性方面,凭借对乡村冰雪、鱼塘、森林、地热温泉、农副产品等资源的充分利用,促成乡村内部生产要素对旅游发展的支撑,以“旅游+”的方式形成休闲农业、休闲林业、休闲渔业、休闲体育等产业。同时,通过旅游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在互补性方面,由政府 and 旅游企业主导,通过优化乡村交通条件、扩大当地知名度、提供工作岗位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等措施,实现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对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促进,同时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为乡村传统产业发展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在该模式中,乡村旅游发展并不由政府“全权负责”,产业效用由政府引导下得以凸显。乡村传统产业得益于“旅游+”的作用,在改善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助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乡村居民增收与产业多元发展共赢。从消费视角看,该模式可为旅游者提供更为丰富的产业体验要素。

二是共治助力模式,即“生态环境和乡村社会共治”助力模式,涵盖可持续性和增权 2 个维度,分别以 234 和 239 个参考点,各占总样本数量的 16.3% 和 16.6%。该模式侧重于非经济价值生产,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的同时,通过生态建设达成“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两个目标。在可持续性方面,案例倾向于通过推广低碳生活、发展低碳产业,使利益相关者具有长期收益,并通过投建文化设施实现生态和文化的可持续性。在增权方面,相较于政府投建公共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等措施,更倾向于政府扮演辅助角色,在通过制定服务标准和协助村民旅游创业以激活乡村内在旅游发展动力的同时,以提高行为准则和能动性的方式对乡村社会实现有效治理。这种“上层引导,下层实施”的方式,有助于同步实现对生态环境和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三是共融助力模式,即“文化遗产和旅游发展共融”助力模式,涵盖嵌入性和网络 2 个维度,分别以 111 和 293 个参考点,各占样本数量的 7.7% 和 20.4%。该模式侧重于社会价值生产,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保障条件的同时,通过社会发展达成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在嵌入性方面,主要通过旅游活动反映本地生活方式和充分使用当地品牌来提升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以及本地文化和传统对旅游发展的嵌入。相较于嵌入性,该模式在网络构建方面的措施则更为丰富。在全域旅游理念下,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实施联合管理、促进小企业互相扶持、指导产业进行布局和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方式等措施,实现乡村居民、旅游产业、旅游者与政府等相关者的网络构建。同时,利用社会网络规范乡村居民与旅游者和产业的交互行为,提升乡村居民对本地的文化认同,

活化和延续乡村文化。从消费体验视角看,这为旅游者提供了优质丰富的文化体验要素,凸显了乡村文化的体验优势。

### (三)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细分类型

以案例节点数在3种模式上的均值为标准,进一步对99个案例进行类型细分。将某一模式节点数高于平均值而另两个模式低于平均值的案例称为主导发展型,得到共赢主导、共治主导和共融主导3种子类型;将2个模式高于平均水平,另1个模式低于平均水平的案例称之为协同发展型,得到“共赢+共治”协同、“共治+共融”协同、“共赢+共融”协同3种子类型;将3个模式均高于或均低于平均水平的案例称之为均衡发展型,分为“共赢+共治+共融”全面发展和“共赢+共治+共融”重点发展2种子类型(见表3)。

表3 中国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类型

类型	子类型(案例数)	案例编号
主导型 46/46.46%	共赢主导发展型(14/30.43%)	22,27,31,36,43,44,46,47,61,63,68,71,86,94
	共治主导发展型(22/47.83%)	5,7,15,25,26,30,32,33,38,42,48—50,64,75,78—80,82,84,90,93
	共融主导发展型(10/21.74%)	1,14,21,23,51,69,74,83,95,96
协同型 28/28.28%	“共赢+共治”协同发展型(9/32.14%)	2,6,8,11,19,35,70,72,98
	“共治+共融”协同发展型(7/25%)	4,10,29,56,81,87,99
	“共赢+共融”协同发展型(12/42.86%)	12,17,28,41,45,54,60,66,67,77,85,88
均衡型 25/25.25%	“共赢+共治+共融”全面发展型(8/32%)	13,16,34,37,40,53,57,62
	“共赢+共治+共融”重点发展型(17/68%)	3,9,18,20,24,39,52,55,58,59,65,73,76,89,91,92,97

1. 主导发展类。主导发展类共有46个案例,占99个案例数的46.46%,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模式的主要大类。第一,共赢主导发展型包含乌村、潭头村、代村等14个案例地,多为产业结构单一、经营管理方式粗犷、居民收入较低、人口外流严重等问题较为严重的乡村。该类型强调“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便利”(参考节点数=188,占比=13.1%),以及“生产规模和产品多样性”(参考节点数=128,占比=8.9%)等措施,以增加收入、减少人口外流。第二,共治主导发展型包括红岩村、化屋村、卡如村等22个案例地,多为区位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较为严重的乡村。这一类型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可持续性”(参考节点数=35,占比=2.4%),以回应上述区位交通和基础设施问题。第三,共融主导发展型包含汤原县、易县、张马村等10个案例地。这些地方居民文化程度较低、思想保守、发展意识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通过强调村民参与旅游服务和构建主客关系等措施,以增强“乡村空间主人”意识(参考节点数=21,占比=1.5%)来促进发展。

3种子类型的发展成效较为一致,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改善、宜居环境提升、乡村居民增收等。共赢主导子类对主体合作的构建更具优势,如潭头村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封开县的“合作社/经营体+基地+农户+电商”和哈纳斯蒙古族乡的“合作社+农户”等,最终促进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共治主导子类整体基础较弱,发展旅游是此类乡村为数不多的可选择路径之一,较之其他子类更依赖政府的帮扶和引导。共融主导子类对于提升当地观念与文化水平、乡土文化保护、文明乡风构建以及降低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的难度等具有独特作用。所以,3种子类面临的问题虽有所侧重,但成效趋同,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但共融主导类在构建乡风文明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作用。

2. 协同发展类。协同发展类共有28个典型案例,占总数的28.28%。第一,“共赢+共治”协同发展型包括铁力市、黄家沟村等9个案例地,除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外,生态问题也较为严重,如东村的采矿业导致地面塌陷、白音部落牧业导致土地沙化等。第二,“共治+共融”协同发展型包括二合村、梁家庄村等7个案例地。此子类共性表现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如二合村为著名雪

乡,新化县为中华始祖蚩尤故里,车田乡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苗族自治乡,古井村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第三,“共赢+共融”协同发展型包括小穿芳峪村、皇城村等12个案例地,具有生态优势显著、种植业特产丰富的共性,如英山县主打四季花海,元坝村是世界最大荔枝种植地,九寨沟县更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此3种子类型中,“共赢+共治”子类与主导发展类的3种子类型相似,依然是针对本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形成的模式,而后两种子类型则是分别依托旅游资源和生态两种优势形成的发展类型。在成效方面,3种子类型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目标的达成均有较好的表现,但“共赢+共治”子类在生态宜居达成方面略有优势,“共治+共融”子类在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的达成上更具优势。

3. 均衡发展类。该类型共有25个典型案例,占总数的25.25%,与协同发展类占比相近。其中,“共赢+共治+共融”全面发展型包括德胜村、镇横坡村等8个案例地,多有基础设施薄弱但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如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区、处于地区生态旅游核心区的乔老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鬃岭的镇横坡村、位于古田会议召开地的上杭县等。“共赢+共治+共融”重点发展型包括克什克腾旗关东车村、谢家路村等17个案例地,数量更多。相较于前者,同样具有基础设施薄弱和产业结构单一的短板,但该类优势中却也存在明显的劣势:一是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资源级别较低;二是距离旅游资源丰度较高的景区较远,难以像前者一样直接获得全域旅游资源开发的“红利”。所以,重点发展型多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共治、共赢和共融的重点环节中,力求以补足短板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

####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世界旅游联盟99个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为分析对象,以一体化乡村旅游理论框架为依据,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归纳出现阶段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3种模式。并以案例节点数在3种模式上的均值为标准,进一步将99个案例划分为主导、协同和均衡3个发展类型和8种子类型:

一是由共赢主导、共治主导和共融主导3种子类型构成的主导发展类。3种子类型的功能划分较为清晰,在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提升交通和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文化思想水平等问题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相较之下,在共治主导型中,发展旅游更多地依靠政府帮扶。共赢主导型则是一种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由政府参与协作的发展方式。共融主导型的村落多为有资源和产业优势的村落,属于“更上一层楼”的发展类型,在政府的引导中村民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二是由“共赢+共治”协同、“共治+共融”协同和“共赢+共融”协同3种模式构成的协同发展类。3种子类型依次在乡村产业转型和生态问题并存、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生态和种植业特产优势显著3种情况中具有较好的适配性。“共赢+共治”协同型适用于具有一定产业基础,但产业发展需要转型的基础薄弱型村庄,政府要兼顾对村落的帮扶和产业引导。“共治+共融”协同型旨在全面优化旅游环境和激发村民的主动性,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促成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共赢+共融”协同型通过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和激发村民主动性,在促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形成一定的资源优势。

三是由全面发展和重点发展2种子类型构成的“共赢+共治+共融”均衡发展类。前者更适用于旅游资源和传统产业基础均较好,且容易获取政府与社会资源的情形,通过打造知名旅游目的地来实现乡村振兴。后者更适用于旅游资源较好但距离区域核心旅游资源较远的乡村,通过重点补齐短板的方式构建村落与核心旅游资源协同发展关系,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赖政府参与,且政府参与的程度和方式由乡村所持有的资源特

征和产业基础决定。主导发展类的3个子类和“共赢+共治”协同发展类更倾向于通过解决文化和旅游资源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共治+共融”和“共赢+共融”2种协同发展子类和均衡发展类的2种子类倾向于通过发挥优势来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优势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优化自身旅游资源、强化村落与核心旅游资源联动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

## (二) 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深化实施旅游资源普查,为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性支撑。99个典型案例均借助政府或旅游企业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清晰认知,形成针对性较强的发展模式和类型。然而,对适应新消费的潜在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首先进行科学和系统的普查与评估,强调正确认识和全面了解旅游资源对资源保护、产品开发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性。

第二,明晰不同资源禀赋、村民认知和文化水平、产业基础等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避免发展的盲目性。一是重视普查工作成果应用,确定重点发展对象。基于旅游资源普查结果,按照问题和优势的类型界定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形成乡村旅游优先开发对象。二是借鉴案例所提供的既有经验,在评估自身优势、问题的基础上,对不同发展模式和类型进行甄选和匹配,形成具有参考价值的具有一定标准化的发展思路,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优化。三是重视发展思路和优先开发对象在项目建设中的联合使用,使对发展思路的评估在优先开发对象项目报送、审批、招标、评审和验收等多个环节发挥作用。

第三,推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一体化发展。一是以高质量发展统领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不仅要把表现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经济指数作为评价标准,而且要把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社会治理推进、文化遗产活化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紧密结合起来,发挥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全面作用。二是为身为乡村主人和乡村文化传承者的乡村居民增权,通过合理的权益分配,激励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在实现生活富裕的同时,兼顾乡村旅游的原真性。三是以主客共融、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的发展思路构建多方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共同体,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助力乡村产业、组织、生态、文化和人才的全面振兴。

第四,以“旅游+”的方式协调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传统农林牧渔等乡村传统产业以“旅游+”的方式转型升级,以休闲农业、休闲林业、休闲渔业等“大休闲农业”发展扩大乡村产业规模,完善乡村产业功能。以旅游文创产品方式复兴乡村手工制作,引导雕刻、柳编、剪纸、陶瓷烧造等乡村手工业产品创意升级,强化线上文化营销,丰富线下消费体验,使乡村手工业向旅游文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在不断满足新消费的同时形成乡村产业新优势。

(感谢米敏同学在案例样本整理等方面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险峰;责任编校:舒隽)